

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 张青仁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20世纪后期开始,美国针对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蓄意输出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市场、推行私有化。从实践和发展的长远效果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让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饱受困扰、深陷困境。其中,作为与美国接壤的拉丁美洲第三大国,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消极影响则更为典型。

墨西哥债务危机让新自由主义改革乘虚而入。20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后,革命制度党于1929年上台执政。在法团主义体系下,革命制度党政府实施以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化”经济战略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交通、能源、公共事业和重点行业国家所有的经济体系。为了整合国内外社会的多元族群和阶层、完成民族国家建设,革命制度党确立了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并相继推行了土地分配、现代农业建设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等战略。革命制度党依托法团主义制度,完成了国家一体化建设,建立了国家干预型的社

会经济发展模式,墨西哥一跃成为拉丁美洲的强国。

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在推动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革命制度党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力包袱,并导致20世纪60年代统治危机的发生。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湾发现大量的石油资源,在石油经济发展的高预期下,革命制度党政府大幅度增加外债贷款。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油价急剧下跌导致石油收入锐减,墨西哥无力偿还贷款,于1982年宣布破产,由此拉开了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深陷债务危机,为美国向其推销新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契机。为了缓解债务危机,墨西哥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援助,前提条件是必须进行宏观政策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以便美国对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干预与支配。于是,20世纪80年代,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在美国的干预和推动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被迫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从1986年起,墨西哥政府陆续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并宣布将向全球开放经济,计划

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此,美国政府、政客与资本家、金融家趁着墨西哥债务危机的机会,按下了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启动键。

墨西哥大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表现为“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三个方面。自由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国家干预,降低贸易壁垒,推动经济全球化。1986年,墨西哥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平均关税税率从1985年的23.5%降至1990年的12.5%。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墨西哥政府取消了美加两国大部分商品的关税,同时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使国内市场进一步向国际资本开放。同时,墨西哥政府大力推进金融自由化,1994年,墨西哥政府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允许外资自由进出。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内容,墨西哥政府通过出售国有企业、放松行业管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墨西哥国有企业的数量从1982年的超过1000家,迅速下降至1994年的不足200家,国有银行更是全部出售给私人资本。墨西哥政府亦大力推进关键行业私有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陆续将电信、电力、石油等战略行业部分私有化,允许外资参与勘探和开采能源资源。2013年能源改革后,石油行业完全向私人资本开放。此外,墨西哥政府大力推进土地私有化。1992年,萨利纳斯政府修改宪法第27条,废除“村社土地集体所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减少政府支出,将原本由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转由市场调节。政府大幅缩减公共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医疗体系逐步向私营保险模式转变,推行“教育分权化改革”,将基础教育管理权下放至各州,鼓励私立学校发展,大力推动养老金私有化,取代原有的国家养老金制度。

新自由主义改革让墨西哥短期获益、长期受损。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施,起初确实短时间内缓解了墨西哥经济困境,解决了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比如,自由化与私有化的改革通过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帮助墨西哥政府暂时稳定了财政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墨西哥跳出新自由主义改革陷阱的本土化探索。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构性困境,墨西哥社会开始探索本土化的发展路径,其中萨帕塔自治运动的实践和国家复兴运动的改革尤为突出。

1994年,印第安人聚集的恰帕斯州爆发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遭受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墨西哥跳出新自由主义改革陷阱的本土化探索。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构性困境,墨西哥社会开始探索本土化的发展路径,其中萨帕塔自治运动的实践和国家复兴运动的改革尤为突出。

1994年,印第安人聚集的恰帕斯州爆发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遭受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墨西哥跳出新自由主义改革陷阱的本土化探索。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构性困境,墨西哥社会开始探索本土化的发展路径,其中萨帕塔自治运动的实践和国家复兴运动的改革尤为突出。

1994年,印第安人聚集的恰帕斯州爆发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遭受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墨西哥跳出新自由主义改革陷阱的本土化探索。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结构性困境,墨西哥社会开始探索本土化的发展路径,其中萨帕塔自治运动的实践和国家复兴运动的改革尤为突出。

1994年,印第安人聚集的恰帕斯州爆发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遭受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状况,将墨西哥从经济崩溃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再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促进了墨西哥对外贸易的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还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转型,开始推进多党竞争制度。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40余年后,其消极影响已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导致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深陷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其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墨西哥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所谓民主化进程表面实现了多党竞争,实则形成了“寡头民主”的畸形格局。商业精英与技术官僚的政商联盟垄断了实际决策权,导致地方治理陷入系统性腐败。

其二,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墨西哥政府决策日益受制于国际资本,国家经济主权遭到严重侵蚀。

其三,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革命制度党时期建立的国家保障体系崩溃,传统的法团主义纽带被彻底瓦解,民众被迫独自承受市场风险,这种政治失信极大削弱了底层民众的国家与文化认同,使得墨西哥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状态,直接导致了社会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

其四,墨西哥经济领域呈现出典型的“依附性发展”特征,宏观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新自由主义极大冲击了墨西哥原本就不健全的产业体系。墨西哥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玉米等主粮从出口转为依赖进口。工业则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占比畸高。1983年后,墨西哥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不足改革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其五,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墨西哥社会结构的极化趋势尤为严峻。改革催生了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占人口10%的精英阶层攫取38%的国民收入,而3200万劳动者深陷非正规就业的贫困循环。

均须爬坡穿越城门外临近右边高台下方的城牆区域,有效拉长敌军进攻路径及被弹面。此次发现的两座南宋城门,分别属第二组(1243年)和第三组(1254年)遗迹。第二组城门偏左,较宽大,进城后在基岩上开凿5米多宽的石梯道,梯道高20厘米左右,宽80至100厘米左右。进门后拐向左边的城牆,梯道穿行在城牆与山崖之间,形成一个宽5米、长80多米的内瓮城。第三组城门右移更靠右边的高台,变窄,在保持梯道瓮城的同时,又利用城门正前方采石形成了一个近1000平方米的大坑,增加了一个新的瓮城。两个城门推测其结构均为排叉柱式,体现出典型的南宋山城防御风格。高台上的哨台、城门配套设施等,也展现了南宋在山地城防技术上的全面创新。

钓鱼城的高台设计,不仅强化了钓鱼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出南宋在山地防御体系上的智慧。它不仅依赖地形优势,还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大化。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

钓鱼城的高台设计,不仅强化了钓鱼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出南宋在山地防御体系上的智慧。它不仅依赖地形优势,还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大化。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

钓鱼城的高台设计,不仅强化了钓鱼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出南宋在山地防御体系上的智慧。它不仅依赖地形优势,还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大化。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

钓鱼城的高台设计,不仅强化了钓鱼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出南宋在山地防御体系上的智慧。它不仅依赖地形优势,还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大化。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

新自由主义改革冲击破产的、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以武装起义形式抗议新自由主义政策,呼吁土著自治和社会公平。萨帕塔主义者以社区为载体,试图构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世界”。他们的实践不仅推动了墨西哥宪法对土著权利的承认,还直接影响了拉美多国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

2018年,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标志着墨西哥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面反思进入实践阶段。洛佩斯政府高举“第四次变革”旗帜,通过成立国家土著研究所、暂停能源领域私有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组合拳,试图扭转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依附和社会不公。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无序扩张,改善了底层民众生活状况。

然而,墨西哥国内试图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本土化探索依旧面临多重挑战。对内,新自由主义遗留的经济依附性和社会分裂问题根深蒂固,土著社群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危机尚未化解;对外,全球资本的压力和美国的干预极大限制了墨西哥政府的政策自主性。此外,如何平衡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需求,避免本土性实践沦为空洞的政治表演,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一场未兑现的“现代化承诺”。这场以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却因加剧社会不平等、侵蚀国家主权、引发社会动荡而饱受争议,导致墨西哥现代化进程再次深陷困境。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惨痛教训警示世人:现代化道路必须立足本土实际,平衡市场效率与社会正义。虽然当前墨西哥社会的多元主体正在探索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路径,但如何摆脱依附性发展、重建多元共生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墨西哥甚至拉美多个国家长期面临的问题。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国家民委区域国别基地“拉丁美洲社会文化中心”主任)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南宋时期的海疆治理

□ 苗书梅

南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背海立国”的王朝,它虽然因金灭北宋偏安江南,却意外开启了其与大海深度交织的独特历程。从立国到亡国,南宋朝廷的命运与大海紧密相连。南宋时期,金和蒙元政权的先后威胁,给南宋政权带来较大的海防需求和压力。同时,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保障海外贸易、维护沿海社会经济秩序、打击猖獗的海盗和走私活动,使得南宋王朝对海疆治理空前重视。南宋王朝通过实施市舶司制度、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完善水军体系等举措,从经济、政治、军事等三个主要方面,不断强化和巩固海疆治理。

实施市舶司制度,保障海外贸易秩序。南宋政治中心坐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离海较近,政府鼓励民众从事海洋开发与经营活动。其中,南宋沿海盐业生产大为发展,榷盐收入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江河入海口与岛屿滩涂造地的规模扩大,依托海上运输与渔业捕捞、以海洋为生的人群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南宋大力鼓励商贾远赴海外经商营利,出台针对来宋外商的优惠政策,允许他们在境内居住,尊重其生活习惯和信仰,并奖励能招徕更多外国商船来宋的蕃商。在此背景下,海外贸易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由此获取的钱物渐成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南宋政府设置了广南、福建和两浙市舶司,下设市舶务,制定“市舶条例”,规范和管理出入境贸易。

南宋市舶司承担着发放出海许可证并办理签押出海手续的重要职责。在商人出海前,市舶司会详细记录贸易船只及其所载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同行人员与担保人姓名等信息。贸易船舶返航后,需先前往市舶司进行抽解,等待官府博买,之后交回许可证,剩余的物资再允许到市场上售卖并交税。对贸易规模大、带回海外物资多、按时回国并依法交税的商人,南宋政府采取减税和授官等激励措施,以此保障政府在海外贸易中的收益。

南宋的市舶司制度为海洋相关的生产和贸易等提供了安全保障,繁荣的海外贸易为南宋加强海疆治理提供了经济基础。

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建立起“专兼搭配”的海疆治理体系。南宋定都临安、“背海立国”,面临着较大的海上入侵威胁。此外,随着盐业专卖、海外贸易等活动为南宋政府 and 商人带来巨额收益,丰厚的收入导致一些人铤而走险从事走私,或者直接在海上劫掠,出现不少大规模海盗、海贼、海寇群体。在这样复杂的因素影响下,南宋急需设置专门的海疆治理机构。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设置沿海制置使司,初设时主要为防御金军南侵,后来以防御海寇、维护治安为主要职能。

沿海制置使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负责训练和管理海上水军、统筹和调动海岸各地其他兵种的海疆治理专职机构,是南宋海防体系中的最高层级机构,其防卫区域包括南宋整个东部与东南部沿海。该机构最初分设在浙东和浙西地区,几经变更,最后只剩浙东沿海制置使司,驻扎在当时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其长官称沿海制置使,通常由知明州(后改称庆元府)兼任,同时设有制置司副使、统制、統領等,由武官担任,负责统领浙东绍兴府与温、台、明诸州的沿海水军,保障东部海疆安全。

除此之外,沿海路一级安抚使、州、县的长官知州和知县,各级其他地方行政官员,在海疆治理中都有相应的职责,属于或相当于兼职的海疆治理官员。驻扎在地方的安抚司水军、殿前司水军、系将不系将禁军等不同兵种,都设置专职的统制、統領、将、副将、队将等级别不同的统兵官,负责带领各地官军缉私、捕盗,是海疆治理的主体。沿海各地方所设的巡检及其土兵、县尉及其統領的弓手等,负责“防把海道,收捕盗贼”,归“州县守令节制”。沿海各地民兵、民间武装力量等,在基层归州县官管理,在路一级归安抚使调度,往往配合官兵参与海疆治理的军事行动。

通过上述相关机构的设置和官员的职责划定,南宋建立起“专兼搭配”的海疆治理体系,为巩固海防、防范和捕捉走私团伙、打击和剿灭海盗等,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组织保障。

南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背海立国”的王朝,它虽然因金灭北宋偏安江南,却意外开启了其与大海深度交织的独特历程。从立国到亡国,南宋朝廷的命运与大海紧密相连。南宋时期,金和蒙元政权的先后威胁,给南宋政权带来较大的海防需求和压力。同时,随着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保障海外贸易、维护沿海社会经济秩序、打击猖獗的海盗和走私活动,使得南宋王朝对海疆治理空前重视。南宋王朝通过实施市舶司制度、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完善水军体系等举措,从经济、政治、军事等三个主要方面,不断强化和巩固海疆治理。

完善水军体系,发挥其海疆防御、打击海盗、缉拿走私等作用。南宋丧失秦岭淮河以北的疆土,长江流域与秦岭淮河之间是南宋抵抗金兵和蒙元南下最重要的防御前线。在东部海域,南宋组建起从淮河入海口经两浙、福建到广南、海南,密布海岸的水军军寨,成为南宋海疆安全的重要保障。

南宋水军创建的重要时期。高宗朝设置的沿海制置使司既有浙东路,也有浙西路。其中,浙西路兵力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分布在江阴军、颍、濠、濠浦、许浦诸寨,由许浦水军都统制司管辖,并兼领淮东路水军,从战略上拱卫南宋都城临安,并负责长江口的海防、打击江海联动的走私和盗寇。

此外,南宋还设置有以下几支水军:一是淮南东路的通州水军,负责长江出海口及其以北江淮的近海与海上防务,后拨归许浦水军都统制司统一管理。二是两浙东路增置的安抚司水军,驻扎在绍兴府余姚县眉山寨等多个水寨,有专门的战舰,负责今天东海近海包括钱塘江入海口以外众多群岛及各海域海上巡逻和安防。三是福建路组建的左翼军水军,分别驻扎在泉州的四个寨,孝宗时期兵力达三千人;福建安抚司所属水军分别驻扎在荻芦寨和延祥寨,两寨水军最多时有一千多人。四是广东路增置的广东水军及潮州水军(又称摧锋军水军),兵力曾达到两千人;广西路的水军,分别驻扎在雷州、琼州、廉州和钦州等港口。其中,钦州水军分驻四个寨,兼有从海上防御交趾的任务。

南宋组建的水军体系,在巩固海疆治理,尤其是打击海盗和缉拿走私、维护海域治安和贸易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上走私和海盗的船队凭借舟楫之便,流动性很大,官兵在浙东展开抓捕时,他们能迅速南下逃至福建;当福建出兵讨伐时,他们又可能转而窜至两广。海盗这种跨海域流窜的特性,使得南宋海疆治理必须依赖不同区域间的密切配合。如绍兴五年(1135年),福建路与广南东路水军联合行动,抓捕了在两路沿海抢劫、聚众多达二百余人、拥有三十余只船舶的“海贼”朱聰。沿海地区这种跨海域的军事联动机制,不同地区之间官兵的相互配合、围追堵截,对那些来回流窜作案的海盗形成威慑,能够大大提高沿海地区打击海盗的效果,有效保障海上贸易的秩序与安全。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月刊》主编)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环球

史话